

“中国式”邻避运动结果的影响因素研究

——对 22 个邻避案例的多值集定性比较分析

高新宇^{1,2} 秦 华²

(1. 安徽财经大学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安徽蚌埠 233030;
2. 美国密苏里大学哥伦比亚分校应用社会科学学部,美国 65201)

摘 要:使用多值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对 2003—2015 年间 22 个典型的邻避运动案例进行系统的比较,结合中国抗争政治的特点提出理解邻避运动成功的探索性分析框架,指出相较资源动员理论,政治机会理论对当下“中国式”邻避运动结果具有较强的解释力。研究发现,风险感知、东部地区、互联网动员、中央媒体支持性报道以及温和型运动策略并存是运动成功的影响因素。针对不同类型的邻避设施,风险感知、东部地区、互联网动员与中央媒体支持性报道并存是污染类邻避运动成功的影响因素;风险感知、东部地区、互联网动员、公民参与与中央媒体支持性报道并存是风险集聚类邻避运动成功的影响因素;风险感知与东部地区共存是心理不悦和污名化类邻避运动成功的影响因素。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我们发现环保组织介入运动可能阻碍抗争的成功。此外,本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抗争结果的研究方法。

关键词:邻避运动;政治机会;资源动员;抗争结果;互联网与媒体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4970(2017)04-0065-09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回顾

“邻避”(Not In My Back Yard),是指社区居民反对在其居住地附近建设诸如变电站、垃圾掩埋场、殡仪馆等具有环境负外部性的公共设施^[1]。关于邻避概念的起源,当前学界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邻避”一词由英国环境事务大臣尼古拉斯提出;另一种观点指出该词最早由英国记者 Emilie 提出,用于描述 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民众对化工垃圾的警觉与反感态度,而后被媒体和学界广泛使用^[2]。近年来,国内邻避冲突层出不穷,成为中国社会运动的日常形式。相关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环境群体性事件保持年均 29% 的增速^[3],其中都市邻避运动较为凸显,逐渐引起学界的关注,涌现出大量的研究文献。有学者认为,随着单位制式微与社区维权运动的兴起,中国已然进入“邻避时代”^[4]。在当前关于邻避的研究中,存在如下 4 类研究取向:①“公民权利说”。持此类观点的学者大多以“国家与

社会”为理论工具,派生出包括关系网络与资源动员、政治机会与公民政治以及社会转型与环保运动等解释框架。其核心观点是作为“新社会运动”的邻避抗争,公民在集体行动中不断地进行“社会学习”^[5],运用丰富资源进行抗争动员与维权。在此过程中,公民的权利意识不断增强,在威权政体的“罅隙”中创造出机会空间,促使政府停止邻避设施的建设,令抗争主体在运动过程中实现从“草民”向“公民”的转变。②“文化与心理论”。邻避抗争中的社会文化情境日渐受到研究者的关注。社会转型期的矛盾累加、相对剥夺感的生成与生产以及民众对环境公平正义的追求,都会影响到邻避冲突的发生和发展。③“网络与媒体论”。随着信息技术的革命,互联网在线论坛、微信、微博等新媒体对邻避运动的影响显著,尤其在运动的动员、组织等方面颇具成效,有利于邻避运动的持续“发酵”。④“性别差异论”。在西方邻避运动中,性别差异是个重要变量。受女性主义思潮影响,在美国许多社区的邻

收稿日期:2017-04-0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4CSH070);国家留学基金委公派项目(201506710064)
作者简介:高新宇(1988—),男,安徽蚌埠人,讲师,博士,从事环境社会学、移民社会学研究。

避抗争中都活跃着女性的身影,成为女性公共参与的崭新领域^[6]。

总体来说,与农民抗争、工人维权等集体行动的结果多以失败告终相比,现阶段我国邻避运动的结果则多以设施停建或迁址、居民取得成功而结束。现有文献积累了相当多关于邻避运动产生、动员、策略等方面的研究,但对邻避运动结果及其影响因素的关注较少,研究的理论导向也并不十分明确。此外,大部分研究都是以个案为基础的经验研究,单案例研究居多,缺乏定量比较研究。个案研究的优势在于能够非常详实地“解剖麻雀”,全面追踪事件发展的整个过程,深入揭示“故事”背后的机制。但这种研究方法的局限性在于较难把握社会现象的一般概况与变化趋势,也很难对一个或几个案例的情况进行概化,且面临着所谓“典型性”问题^[7]。基于上述认识,笔者将首先回顾影响社会运动与邻避运动结果的相关理论系谱。然后采用定性比较分析法,对22个典型邻避案例的结果进行荟萃分析,尝试对邻避运动结果的影响因素展开综合性探究,重点关注“中国式”邻避运动在何种条件下更容易成功?同时,还将分析不同类型^①的邻避运动结果的影响因素。

在西方社会抗争的研究中,邻避运动占有重要的地位,涌现出大量的研究成果。首先对国外社会运动结果的相关研究进行简要回顾,进而重点梳理中外学者关于邻避运动结果的研究文献,最后综合当下研究现状,展开述评。

1. 西方社会运动的结果及其影响因素

西方学者从社会运动的资源动员、政治机会、抗争策略以及组织能力等视角对社会运动的结果进行阐释。社会运动的结果受如下诸多因素影响:运动参与者的利益驱使、组织能力、动员能力、个体加入社会运动的阻碍或促进因素、政治机会结构、社会运动群体所具有的力量。以上因素通过有机的组合对社会运动的形成、过程和结果产生影响^[7]。资源动员理论强调社会组织的重要性,甘姆森研究发现,那些具有单议题诉求、存在中央集权式管理架构、有良好的科层制、使用选择性激励与破坏性策略且无派系斗争的社会运动更可能取得成功^[8]。20世纪70年代以来,政治机会结构理论经历了从附属于资源动员理论到专门化的发展过程。Giugni等认为,政治机会结构是解释社会运动和革命影响的关键^[9]。不同的抗争策略不仅会影响社会运动的效果,而且还决定抗争行动能否实现既定的目标。皮文等通过对美国历史上穷人生存运动的研究发现,暴力化是此类运动的典型特征,通过“闹大”引起政府当局的

妥协,从而实现诉求^[10]。亦有学者指出,过分地使用对抗性策略可能会引起公众的反感与政府的警觉,从而消解运动目标的实现^[11]。

2. 邻避运动的结果及其影响因素

西方社会运动理论有助于更好地理解邻避运动的发生、发展和结果。以往研究主要关注邻避运动的本质、成因、动员机制与行动策略。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邻避抗争的结果及其影响因素。Kasperson研究指出,对邻避设施风险认知的缺乏使得公众易产生“过激反应”,导致运动的升级进而影响抗争结果。风险感知往往和风险放大相伴而生,共同影响着邻避行动的结果^[12]。

邻避运动中的资源与网络对抗争结果作用显著。姆托夫比较6个邻避运动案例的结果,分析了为何有些运动组织拓展了其目标且取得显著效果,而另一些运动组织却不然。他的研究发现影响运动成功的关键在于邻避运动组织成员友谊网络的多寡。良好的外部资源与朋友网络有助于建立组织成员间的信任关系,促进运动的成功。同时,他亦发现,较之于地方性的邻避抗争,全国性的邻避运动由于其丰富的资源存量而更易取得成功^[13]。Halebsky使用定性比较法分析了6起沃尔玛选址之争运动的结果。他认为赢得媒体的支持、建构宽泛的议题以动员民众参与抗争、注重与反运动力量的博弈是地方化邻避运动成功的重要条件^[14]。

随着信息技术的日臻成熟,互联网动员对邻避抗争结果的影响日益显现。Carrett区分了网络对抗争政治影响的3种类型,即“互联网作为动员结构”“互联网作为政治机会”“互联网作为框架化工具”^[15]。Carrett的研究并未关注互联网是通过何种机制影响邻避运动的结果的,但后续研究弥补了这一缺憾。Castells指出互联网通过动员抗争运动中的主客体使其通过持续的在线互动达成认同,进而为运动的成功创造空间^[16]。

政治机会对邻避运动影响颇深。Edward等通过对两个社区反对垃圾焚烧场建设运动的结果比较发现,公民参与程度和政体的开放程度是影响邻避运动结果的重要条件^[17]。麦克亚当等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研究公众对16个跨国石油和天然气管道选址的抗争,发现政治机会和法律以及公共协商是邻避运动成功的必要条件^[18]。有

①依据国内主流观点,邻避运动可划分为污染类邻避运动、风险集聚类邻避运动以及心理不悦与污名化类邻避运动。参见张乐,董星. 2013。

学者认为社会媒体的关注与新闻报道的支持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邻避参与者的行动合法性,为运动的话语扩散搭建互动平台从而影响运动的结果^[19]。

此外,邻避行动者的策略选择也会影响抗争的结果。Futrell 以美国民众反对化学武器厂建设为例,指出了框架过程与认知解放对运动的动员机制。他认为不同运动的框架建构与策略选择所导致的运动结果迥异。运动参与者倾向于选择运动话语来动员具有相似价值观的伙伴,以促进运动的成功^[20]。

以上研究分析了西方学界关于影响邻避运动结果的一些基本因素。研究中国抗争政治和邻避运动的学者一方面试图找寻与西方国家类似的、影响中国公民邻避运动结果的共同因素,另一方面又立足于本土社会情境,着力发掘不同于西方的“中国特色”。首先,公众对邻避设施的风险意识影响其抗争行动。郭巍青和陈晓运指出,邻避运动中环境异议的根源在于民众通过风险规避“反推断”与“风险戏剧化策略”使得邻避风险成为公共主张^[21]。其次,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新媒体对邻避抗争影响显著。Sullivan 等采用网络分析法考察了社会网络和互联网对中国环境行动主义的作用。他们认为,在线互动网络对邻避行动者的抗争实践具有促进功能^[22]。再次,丰富的资源、关系网络与恰当的抗争策略成为民众邻避行动致胜的“武器”。石发勇以一个街区的环保运动个案为例,分析了关系网络对邻避运动结果的影响。研究发现动员维权精英与普通参与者、获取高层权威支持、收集对手的信息和违法证据有助于运动的成功^[23]。吴阳熙指出现阶段温和理性的非暴力化邻避抗争策略通常较为有效,法理框架下的权利诉求可在一定程度上规避运动的政治风险^[24]。曾繁旭基于对一组邻避运动案例的实证研究发现,媒体在建构抗争剧目、运动框架以及增强运动的合法性等方面意义深远^[25]。中国环境保护组织(以下简称环保组织)在环境抗争中的意义具有两面性。杨国斌分析了环保组织的动力机制,并强调其在环境运动资源动员领域的重大作用,有助于推动中国公民社会的建设^[26];同时他亦指出在影响较大的敏感性环境事件中,环保组织的过度介入不利于运动目标的实现。再次,政治机会亦对邻避抗争结果产生影响。陈占江研究湘中农民邻避运动时指出,政治机会的缺乏和“政经一体化共谋”消解了农民的环境抗争^[27]。郭红欣认为在邻避设施选址阶段,开放的政治空间与充分的公民参与有助于公民环境权益的实现^[28]。最后,不能忽视区位因素对抗争结果的影响。Hurst 分析了中国 3 个地区的下

岗工人维权运动结果,发现相较于中部地区,东部沿海和东北老工业基地的下岗工人抗争运动结果更为有效。他认为造成结果分异的原因可能在于地方政府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地方—中央”间关系对运动结果产生的显著影响^[29]。

3. 研究述评

既有的文献增进了对邻避运动结果的认知,但亦存在一些局限。首先是西方理论在研究中国邻避运动结果影响因素时的解释力问题。前文已述,西方学者认为,组织能力、对抗性策略的使用与政治机会是影响社会抗争结果的主要因素^[30]。较之于西方邻避运动高度的组织化特点与开放的政治机会,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中国的中层组织力量十分薄弱,缺乏运动的核心组织^[31]。其次,囿于政治风险和压力,中国的社会运动,特别是以中产阶级为代表的业主邻避抗争往往呈现“去组织化”的特点^[32],民众倾向于选择制度内的维权路径。再次,媒体在邻避运动中的作用日益显著(特别是中央媒体,一旦中央媒体介入运动,往往会改变抗争双方的力量对比)。此外,与传统的资源动员理论关注资金与人力资源迥异,“中国式”邻避运动的资源动员应重点研究“关系”在当下抗争实践中的巨大作用。最后,从研究方法上看,学界对中国社会运动尤其是邻避运动结果的影响因素的研究较为鲜见,少量关于该主题的研究较多使用个案分析。笔者尝试采用多值集定性比较分析法对 22 个邻避运动案例进行分类剖析,试图在以下两方面进行探索:其一,总结相关国家中邻避运动成功的条件;其二,考察资源动员、政治机会、运动策略等对我国邻避抗争的影响以及与西方研究的差异,以期推动经典理论的本土化实践。

二、研究方法与案例来源

1. 研究方法

定性比较分析法的对因果关系的理解与定量研究不同。后者假定社会现象的因果关系是线性的,而前者则假定社会现象的因果关系是非线性的,并且是可替代的。首先,QCA 关注的是社会现象多重条件并发的原因,同一社会现象的发生可能是由不同的原因组合所导致的^[33]。例如,条件 A 与条件 B 同时出现导致结果 Y($A * B \rightarrow Y$);条件 C 与条件 D 同时发生也可引致结果 Y($C * D \rightarrow Y$);即($A * B + C * D \rightarrow Y$)($*$ 表示“同时出现”;“+”表示“或”)。其次,QCA 的分析单位是条件组合而不是案例。在分析过程中,第一,研究者需先根据研究问题确定典型案例;第二,根据相关理论,确定结果变量与条件变量;第三,依据解释条件建构真值表(truthtable),

在此过程中会遇到矛盾组合(即相同的条件组合导致不同的结果),这种情况需要校准;第四,依照布尔代数运算逻辑简化条件组合,得到因变量发生或者不发生的条件或条件组合。最后,QCA 是基于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的推断逻辑,而非统计推断逻辑,换言之,QCA 分析“非对称因果关系”,即不能从 $A=Y$ 直接推断出 $a\neq y$ 。在分析过程中,研究者既可分析社会现象发生的原因(Y),也可分析其不发生的原因(y)。分析前者时,后者对应的数据不纳入分析过程,反之亦然。定性比较分析法在一定程度上综合了定性研究的特点与定量研究的优势,在中小样本案例研究中作用显著。自从拉金发明定性比较方法以来,QCA 扩展为了确定集(crisp set)、模糊集(fuzzy set)以及多值集(multi value)3 种具体操作方法。确定集定性比较分析(cs-CQA)只能处理二分变量;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使用模糊集得分来表示结果和解释条件发生的可能性,其程度原则上可以是 0 至 1 之间的任何数值^[34]。克隆维斯于 2004 年发明了可以处理多值类别变量的多值集定性比较分析(即在确定集二分法的基础上,对变量信息进行多分,以增加变量的信息)(mv-QCA),mv-QCA 使用德国政治学家克朗克其斯特开发的 TOSMANA(Tool for small-n analysis)软件进行操作。3 种操作方法各有特点,需要研究者根据研究内容进行选择。定性比较分析方法的优势在于可

以通过对不同案例的深度检验,从而寻求对现有理论进行进一步的扩充和完善^[35]。选用多值集定性比较分析法(mv-QCA)对邻避运动进行探究的原因在于邻避运动类社会抗争的结果一般比较清晰明确(成功或失败),但其复杂的影响因素却不能全部用二分变量进行测量。由于选取的典型案例数量符合 QCA 的分析要求,因此多值集定性比较分析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较好地检验研究内容。

2. 案例来源

(1)典型案例的选取

前已述及,QCA 的首要步骤是根据研究问题确定案例。我们检索中国知网(CNKI)、谷歌学术搜索(Google Scholar),共搜集符合研究主题的英文文献 385 篇,经过讨论筛选最终确定对 30 篇文献(包括 22 个邻避运动案例)进行分析(表 1)。案例选取遵循如下原则:第一,所选案例应具有代表性,即该案例具有较大的社会影响力,引发媒体大量报道和学术界广泛关注;第二,入选案例在地域、发生时间以及邻避项目类别上具有多样化特征,本文案例在地域上包含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发生时间跨度为 2003—2015 年,案例覆盖污染类、风险集聚类、心理不悦与污名化 3 类邻避运动。第三,案例所能查阅的资料较为全面,即在学术论文、新闻报纸以及网络贴吧均可获取事件信息,尽可能地增强信息的完备性与准确性。第四,搜集国内外文献中对本研究中

表 1 “中国式”邻避运动典型事件

案例编号	发生时间	事件名称	邻避运动类型	文献来源
1	2003 年	北京芳雅家园小区反对电机厂事件	污染类	Wu and Dai 2014
2	2005 年	安徽蚌埠仇岗村民反对化工厂事件		高新宇,许佳君 2015
3	2007 年	北京反对六里屯垃圾焚烧厂事件		Thomas 2013
4	2009 年	北京反对阿苏卫垃圾焚烧厂事件		Wu and Dai 2014
5	2009 年	广州番禺发对垃圾焚烧厂事件		Sun 2015
6	2011 年	北京反对南宫垃圾焚烧厂事件		Benjamins 2014
7	2012 年	上海松江反对垃圾焚烧厂事件		王奎明等 2013
8	2012 年	四川什邡反对钼铜项目事件		孙静 2013
9	2012 年	江苏启东反对纸业排海工程事件		Shi 2014
10	2006 年	广州南景花园小区反对变电站事件	风险集聚类	何艳玲 2009
11	2007 年	福建厦门反对 PX 项目事件		周志家 2011
12	2008 年	上海反对磁悬浮事件		郑卫 2011
13	2011 年	安徽望江反对彭泽核电厂事件		张乐 2015
14	2012 年	浙江宁波反对 PX 项目事件		Cu 2016
15	2012 年	北京反对京沈高铁事件		Mol2016
16	2014 年	广东茂名反对 PX 项目事件		Ma2016
17	2011 年	四川眉山反对精神病院事件	心理不悦与污名化类	黄昱 2011
18	2012 年	广东佛山反对明康监狱事件		叶能军 2012
19	2014 年	广州化州反对殡仪馆事件		冯璐 2014
20	2014 年	浙江杭州朝晖九区反对老年护理中心事件		陆玫 2014
21	2014 年	海南海口反对麻风病医院事件		谭翠,胡象明 2015
22	2015 年	上海心仪雅苑社区反对敬老院事件		姜丽钧 2015

资料来源:根据典型邻避运动案例整理而得

所入选的邻避运动案例的研究,尝试从中外学者的不同视角展开分析。第五,除以上数据资料外,笔者还使用了2009—2015 年对50 余位邻避运动参与者的访谈资料对本文分析结果进行检验。此外,数据收集过程持续半年以上,作者通过与课题组成员讨论对解释变量进行多次修改并且通过不同来源对案例信息进行交叉检验,确保数据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

(2) 变量测量

笔者关注的结果变量是邻避运动的结果。若案例中,公众通过集体行动促使邻避设施停建或迁址赋值1,设施继续建设则赋值0。根据惯例,对中等样本的条件解释变量最好是4—7 个^[36]。在借鉴国内外社会运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从心理因素、资源动员、政治机会、运动策略和区位因素5 个维度(包含7 个条件解释变量)进行变量界定。

心理因素用公众对邻避设施的风险感知来测量。风险感知是一个主观概念,其意涵为民众对风险的态度和对风险的直觉判断,风险感知往往与风险放大相伴而生^[12]。在邻避运动中,正是基于对邻避设施风险的担忧与恐慌,引致公众聚集和反抗,推动邻避行动的升级。若案例中出现风险感知放大并促使邻避运动升级赋值1,反之赋值0。

资源动员使用互联网动员和环保 NGO 两个指标测量^[18]。互联网动员是指公众利用互联网等新媒体平台(在线论坛、QQ 群、微信、微博等)在虚拟空间有意图地传播诱导性信息,引导意见倾向,从而获得网民的支持与认同,并鼓动、协调和指挥受众在现实社会空间进行集体行为的行为和过程^[37]。有学者认为,互联网促进了社会运动中的有效交流、沟通、组织与协商且其低成本、匿名性、即时性提高了动员的效力^[38]。在邻避运动的发生发展阶段,有效的网络动员有利于公共议题的生成与发展,促进线上抗议向线下行动的转化。若案例中存在互联网动员则赋值1,反之赋值0。

环保 NGO 是在生态环境领域从事工作的具有公益性的社会组织。关于环保 NGO 介入社会运动的效果,学界存在两种理论分野:一种观点认为环保 NGO 通过普及生态知识与法律常识,使得公众初步获得与污染企业进行抗争的知识资本,同时,通过媒体建构公共议题推动环保运动的发展^[39];另一种观点指出,在“政治全能主义”的中国,环保 NGO 的政治机会受到限制,特别是介入敏感事件,其作用反而适得其反^[40]。若案例中存在环保 NGO 介入,赋值1,反之则赋值0。

政治机会的测量包括公民参与和中央媒体的支

持性报道两个指标^[41]。公民参与影响民众对邻避设施的接受程度,是邻避设施选址的原则。有效的公民参与可以消除居民对政府的不信任,推动官—民良性互动以及我国民主化进程。若案例中邻避设施选址阶段存在公民参与,赋值1,缺乏公民参与,赋值0。

中央媒体支持性报道是指《新华每日电讯》《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等中央媒体明确发布支持邻避抗争者的新闻。中央媒体基于其自身影响力,对事件进行正面宣传,这将有利于运动扩散与合法性建构。若案例中存在中央媒体的支持性报道,赋值1,无中央媒体支持性报道则赋值0。

运动策略可用邻避运动的强度指标测量。具体言之,是指在邻避抗争进行过程中,居民集体行动的理性化程度,是“踩线而不越界”的温和抗议,还是存在打砸抢等不理智的暴力冲突。前者以厦门反对PX 项目为典型,后者以江苏启东事件为代表。若案例中出现严重暴力反抗行为赋值1,运动较为温和与理性赋值0。

区位因素^①使用邻避运动发生的地区测量。该指标设置的目的在于考察区域间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是否对抗争的结果产生影响。理论与经验材料显示,东部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公民素养、媒体开放程度等优于中西部地区,所以发生在东部地区的抗争运动的成功率可能高于中西部地区。若案例中邻避运动的发生地为东部地区赋值0,中部地区赋值1,西部地区赋值2。

三、真值表建构与定性比较分析结果

1. 真值表建构

依据变量赋值标准,对入选案例相关变量进行赋值,结果参见表2。

2. 分析结果

使用TOSMANA 软件,对真值表(表2)进行布尔最小化分析发现,有6 个原因组合导致邻避运动成功(表3)。

总而言之,在以上6 组导致邻避运动成功的条件组合中,其一致性均为1.00,说明模型显著性较

①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信息显示,我国(除台湾省)31 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被划分为4 个地区:东部(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中部(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西部(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东北(辽宁、吉林和黑龙江)。参见 <http://www.stats.gov.cn/ztcj/zthd/sjtjr/dejtjkfr/tjqp/201106> [EB/OL]. 本研究所选择的案例分布在东、中、西部地区,无东北地区案例。

表 2 真值表 ^①								
心理因素	资源动员		政治机会		运动策略	区位优势	运动结果	案例标识
风险感知	互联网动员	环保组织	公民参与	中央媒体	邻避强度	地区		
1	0	0	1	0	0	0	1	1
1	0	1	0	1	0	1	1	2
1	1	0	0	1	0	0	1	3;5;7;12
1	1	1	1	1	0	0	1	4;11
1	1	1	0	0	0	0	0	6
1	1	0	0	1	1	2	1	8
1	1	0	0	0	0	0	0	10
1	1	1	0	1	0	1	1	13
1	1	0	1	1	0	0	1	15
1	1	0	1	0	0	2	1	17
1	0	0	0	1	0	0	1	19;20
1	0	0	0	0	0	0	1	22

表 3 影响邻避运动成功的原因组合		
可能的原因条件组合	一致性	覆盖率
风险感知 * 无互联网动员 * 无环保组织介入 * 无中央媒体支持性报道 * 温和型运动 * 东部地区	1.00	0.13
风险感知 * 环保组织介入 * 无公民参与 * 存在央媒支持性报道 * 温和型运动 * 中部地区	1.00	0.13
风险感知 * 无环保组织介入 * 无公民参与 * 存在中央媒体支持性报道 * 温和型运动 * 东部地区	1.00	0.40
风险感知 * 存在互联网动员 * 存在公民参与 * 存在中央媒体支持性报道 * 温和型运动 * 东部地区	1.00	0.20
风险感知 * 存在互联网动员 * 无环保组织介入 * 无公民参与 * 存在中央媒体支持性报道 * 暴力化运动 * 西部地区	1.00	0.07
风险感知 * 存在互联网动员 * 无环保组织介入 * 存在公民参与 * 无中央媒体支持性报道 * 温和型运动 * 西部地区	1.00	0.07
所有组合	1.00	1.00
注:在使用 TOSMANA 软件进行布尔最小化运算时,选择排除矛盾项		

好,总覆盖率为 1.00,表示 6 种条件组合解释了 100% 的案例,解释力较强。分而视之,每种条件组合单独的覆盖率较低,其中“风险感知 * 东部地区 * 无环保组织介入 * 无公民参与 * 有中央媒体支持性报道 * 温和型运动”与“风险感知 * 东部地区 * 存在互联网动员 * 存在公民参与 * 有中央媒体支持性报道 * 温和型运动”条件组合覆盖率相对较高,在 6 种条件组合中对结果影响较大。

综观上述定性比较分析结果^②可知,在当前的邻避运动中,抗争成果取决于公众强烈的风险意识、发生在东部地区、无环保组织介入、有中央媒体的支持性报道以及采取温和理性的抗争手段并存。一方面,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公民性等因素来看,东部地区的邻避运动成功的可能性大于中、西部地区;另一方面,在众多邻避抗争案例中,环保组织囿于“合法性困境”^[42],其在邻避运动动员、培训、议题

拓展等方面的作用受到制约。究其原因在于社会转型期权力分布的失衡,国家依然是权力的中心和源泉。虽然相比改革前,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式微,但是在“政治全能主义”的中国,结社与组织化仍旧受到严格的审查与监控。特别是当重大且敏感环境性群体事件发生时,环保组织的高调介入反而会引起政府的警觉,不利于运动目标的实现。此外,中央媒体在邻避运动中的支持立场有助于建构运动的合法性和政治机会空间,推动邻避运动的成功。

邻避设施的属性特征不同,其所引致的邻避运动结果的影响因素可能迥异。将 22 个邻避案例划分为污染类、风险集聚类、心理不悦与污名化类 3 种。笔者选择真值表中对应的数据进行定性比较分析,结果见表 4。

表 4 不同类型邻避运动成功的原因条件组合 ^③			
邻避运动类型	可能的原因条件组合	一致性	覆盖率
污染类	风险感知 * 东部地区 * 存在互联网动员 * 无环保组织介入 * 无公民参与 * 存在中央媒体支持性报道	1.00	0.50
风险集聚类	风险感知 * 东部地区 * 互联网动员 * 存在公民参与 * 存在中央媒体支持性报道 * 温和型运动	1.00	0.50
心理不悦与污名化类	风险感知 * 东部地区 * 无互联网动员 * 无公民参与 * 无中央媒体支持性报道 * 温和型运动	1.00	0.75
注:在使用 TOSMANA 软件进行布尔最小化运算时,选择排除矛盾项选项			

由表 3、表 4 可知,首先,风险感知与中央媒体

①由于在使用 TOSMANA 软件进行布尔最小化运算时,选择排除矛盾项选项,所以,实际纳入分析的案例数为 17 个。

②从 6 组影响邻避运动成功的条件组合中选取两组一致性与覆盖率相对较高的条件组合进行理论分析。

③根据 QCA 分析结果,不同类型的邻避运动成功的影响因素共有 6 个条件组合,笔者根据一致性与覆盖率选取模型效果较好的 3 个条件组合进行分析。

支持是3类邻避运动成功的必要条件。通过对污染类邻避运动案例的审视可知,邻避设施周边的居民正是由于对环境和健康的担忧,产生了恐惧心理并促使其集中进行邻避抗争。媒体在社会运动动员中起到核心作用,尤其是中央媒体,较少陷入地方政府与污染企业编织的“权力利益结构之网”,其报道更加客观、公正且易引起高层的关注,加速环境问题的解决。其次,在法律许可范围内的温和型抗议成为邻避抗争者首选的策略。在当前的政治环境下,采用激进的维权方式将面临巨大的政治风险,“依法维权和以理抗争”成为公众表达诉求的方式。再次,互联网动员因素在污染类与风险集聚类邻避运动中起显著作用,特别是在线业主论坛,对地方邻避抗争影响颇深^[43]。此外,公民参与因素对邻避运动成功的影响不显著。究其原因,可能与当前的公民参与往往流于表面,形式性大于实质性有关。最后,对于心里不悦与污名化类邻避运动而言,邻避设施造成的损失是间接的,囿于文化禁忌与偏见,此类邻避运动主要表现为社区污名化,具体表现为影响居住心情以及导致房价下降,居民容易形成抗争动机^[44]。

四、结论与讨论

1. 结论

笔者以“中国式”邻避运动为例,使用多值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考察了2003—2015年间22个邻避抗争案例,以此来探讨具有代表性的邻避事件的特征以及得以成功的条件。从社会转型期邻避运动的特征观之,具有如下4个方面:首先,不同于欧美国家,中国的邻避运动范围仍局限于变电站、垃圾焚烧厂、PX项目等常规型邻避设施,较少涉及养老院、殡仪馆等特殊型邻避设施。其次,迥异于发达国家大规模的组织化抗争,当下的中国邻避运动常常发端于个体理性维权,进而发展成小规模在社区层面的小集团抗争,最后扩大为“无组织、有纪律”的都市集体行动。再者,利益诉求单一,较少涉及政治议题。最后,参与群体以城市中产阶层为主。

定性比较分析(QCA)结果发现,风险感知、互联网动员、中央媒体支持性报道以及温和理性的运动策略共存是抗争成功的影响因素。分别比较三类邻避运动发现,风险感知对3类运动成功皆具推动作用。互联网动员和中央媒体支持性报道对污染类邻避运动成功影响显著;公民参与、风险感知和中央媒体支持性报道促进风险集聚类邻避运动的成功,环保组织介入可能会阻碍运动的顺利进行。从地区层面而言,东部地区邻避抗争成功的可能性要大于

中西部地区。相对于资源动员理论,政治机会理论对当下我国邻避运动结果解释力较强。总之,风险意识与理性参与是促使邻避抗争成功的核心因素。

2. 讨论

通过前文的研究结果,结合邻避研究相关理论,我们尝试探讨如下两个问题:①“中国式”邻避冲突的治理策略;②环保组织介入为何会阻碍邻避运动的成功。对于前者,一方面,政府要重视公众的风险感知。已有研究表明风险感知与行动者的行为选择密切相关^[45],政府应及时与公众进行有效的风险沟通,增加彼此间的信任及对邻避设施的客观认知。另一方面,政府应开通协商性对话渠道,在邻避设施选址阶段引入环境影响评价和公民参与机制,切实赋予这两种机制实然的意义,而不能仅仅是形式上的存在。从公众角度分析,第一,维权运动应在法律的框架下理性而有序的进行。一方面,和总体性社会时期一样,当前政府仍将“维稳”作为当前工作的重点,制度外的抗争行动面临着巨大的政治风险与组织风险;另一方面,我国的法制化进程不断深化,依法维权成功的可能性日益增加。第二,互联网与媒体对当下的抗争影响颇深。互联网与媒体作为“运动企业家”在抗争动员、公共议题建构以及问题化方面意义斐然,有助于社会运动的风险消解与合法性建构^[46]。对于后者,笔者认为,大多有影响力环保组织均“挂靠”一定的行政单位,具有“官民二重性”特征,其行动往往受制于政府,在邻避抗争中“集体失语”。而另外一部分民间草根环境NGO,囿于“合法性困境”、资源经费以及自身影响力,即使介入邻避运动,效果也是甚微。正如环境政治学者郁庆治所言,“中国的环境运动是无法让环保组织的人来进行的,环保组织一旦和环境运动沾边,其命运就多舛了。”^[47]

本文研究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首先,使用互联网上搜集的学术文献、新闻报道等研究资料作为案例分析的文本,可能会存在选择性偏误。我们所考察的案例均为影响力较大的邻避运动,其研究结论是否适用于所有类型的邻避运动,值得商榷。其次,由于资源限制,本研究的样本略小。若能获取更大规模邻避运动案例,那么结论可能具有更强的经验基础。最后,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通过案例比较和阐释邻避抗争成功的影响因素,意味着笔者并未对每个案例进行“深描”,探究影响因素和运动结果之间的动态关联机制。在之后的研究中,应加大对案例中“关键人”的深度访谈,实现虚拟民族志与传统质性研究、定量与定性研究的有机结合,更为深入地理解邻避行动者的动机和策略对抗争结果的影响。

参考文献:

- [1] DEAR M. Understanding and overcoming the NIMBY syndrome [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 1992, 58 (3): 288-300.
- [2] 郎友兴, 薛晓婧. “私民社会”: 解释中国式“邻避”运动的新框架[J]. 探索与争鸣, 2015(12): 37-42.
- [3] 高新宇. “中国式”邻避运动: 一项文献研究[J]. 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4): 41-48.
- [4] 何艳玲. “中国式”邻避冲突: 基于事件的分析[J]. 开放时代, 2009(12): 103-114.
- [5] 崔晶.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行为研究[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6, 26(8): 63-69.
- [6] ZELEZNY L C, CHUA P, ALDRICH C. Elaborating on gender differences in Environmentalism [J].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2000, 56(3): 443-457.
- [7] 盛智明. 组织动员、行动策略与机会结构: 业主集体行动结果的影响因素分析[J]. 社会, 2016(3): 110-139.
- [8] GAMSON W. The strategy of social protest [M]. Illinois: The Dorsey Press, 1990.
- [9] GIUGNI M, YAMASAKI S. The policy impact of social movements: a replication through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J]. Mobilization: A International Journal, 2009, 14(4): 467-484.
- [10] PIVEN F F, CLOWARD R A. Poor people's movement [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9.
- [11] TARROW S. Power in movement [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 [12] ROGER E K, ORTWIN R, PAUL S, et al. The social amplification of risk: a conceptual framework [J]. Risk Analysis, 1988, 8(2): 177-187.
- [13] SHEMTOV R. Social networks and sustained activism in local NIMBY campaigns [J]. Sociological Forum, 2003, 18(2): 215-244.
- [14] HALEBSKY S. Explaining the outcome of antisuperstore movement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six communities [J]. Mobilization: A International Journal, 2006, 11(4): 443-460.
- [15] CARRETT R K. Protest in an information society: a review of literature on social movements and new ICTs [J].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2006, 9(2): 202-224.
- [16] CASTELLS M. Communication, power and counter-power in the network society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07(1): 238-266.
- [17] EDWARD W, REX W, CLAYTON D S. Backyards, NIMBYs, and incinerator sitings: implications for social movement theory [J]. Social Problems, 1993, 40(1): 25-38.
- [18] MCADAM D, SCHAFFER H B, DAVIS J, et al. “Site fights”: explaining opposition to pipeline projects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J]. Sociological Forum, 2010, 25(3): 401-427.
- [19] VASI I B, WALKER E T, JOHNSON J S, et al. “No fracking way!” Documentary film, discursive opportunity, and local opposition against hydraulic fractur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2010 to 2013 [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015, 80(5): 1-26.
- [20] ROBERT F. Framing processes, cognitive liberation, and NIMBY protest in the U. S. chemical-weapons disposal conflict [J]. Sociological Inquiry, 2003, 73(3): 359-386.
- [21] 郭巍青, 陈晓运. 风险社会的环境异议——以广州市民反对垃圾焚烧厂建设为例 [J]. 公共行政评论, 2011(1): 95-121.
- [22] SULLIVAN J, XIE L. Environmental activism, social networks and the internet [J]. The China Quarterly, 2009(198): 422-432.
- [23] 石发勇. 关系网络与当代中国基层社会运动——以一个街区环保运动个案为例 [J]. 学海, 2005(3): 76-88.
- [24] 吴阳熙. 我国环境抗争的发生逻辑——以政治机会结构为视角 [J]. 湖北社会科学, 2015(3): 26-31.
- [25] 曾繁旭. 环境抗争的扩散效应: 以邻避运动为例 [J]. 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3): 110-115.
- [26] YANG G B. Environmental NGOs and institutional dynamics in China [J]. The China Quarterly, 2005(181): 46-66.
- [27] 陈占江. 制度紧张、乡村分化与农民环境抗争——基于湘中农民“大行动”的个案分析 [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3): 1-9.
- [28] 郭红欣. 论环境公共决策中风险沟通的法律实现——以预防型环境群体性事件为视角 [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J]. 2016, 26(6): 100-106.
- [29] HURST W. Understanding contentious collective action by Chinese laid-off workers: the importance of regional political economy [J].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2004, 39(2): 94-120.
- [30] 俞志元. 集体性抗争行动结果的影响因素——一项基于三个集体性抗争行动的比较研究 [J]. 社会学研究, 2012(3): 90-112.
- [31] 赵鼎新. 西方社会运动与革命理论发展之述评——站在中国的角度思考 [J]. 社会学研究, 2005(1): 168-209.
- [32] 陈晓运. 去组织化: 业主集体行动的策略——以 G 市反对垃圾焚烧厂建设事件为例 [J]. 公共管理学报, 2012(2): 67-75.
- [33] 李蔚, 何海兵. 定性比较分析方法的研究逻辑及其应用 [J]. 上海行政学院学报, 2015(5): 92-99.
- [34] VINK M P, VLIET O V. Not quite crisp, not yet fuzzy? Assessing the potentials and pitfalls of multivalue QCA [J]. Field Methods, 2009, 21(3): 265-289.

[35] 阿克塞尔·马克斯,贝努瓦·里候科斯,查尔斯·拉金. 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定性比较分析法——近 25 年的发展及应用评估[J]. 臧雷振,译. 国外社会科学,2015 (6):105-112.

[36] RUDEL T K. Meta-analyses of case studies; a method for studying regional and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J].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2008(18): 18-25.

[37] 刘晓丽. 群体性事件中的网络动员与政府应对策略[J]. 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13(2):61-64.

[38] BIMBER B, FLANAGIN A J, STOHL C. Reconceptualizing collective action in the contemporary media environment [J]. Communication Theory, 2005, (15): 365-388.

[39] 黄荣贵,桂勇. 互联网与业主集体抗争:一项基于定性比较分析方法的研究[J]. 社会学研究,2009(5):29-56.

[40] YANG G B, CALHOUN C. Media, civil society, and the rise of a green public sphere in China [J]. China Information, 2007, 21(2): 211-236.

[41] 黄荣贵,郑雯,桂勇. 多渠道干预、框架与抗争结

(上接第 39 页)

六、结 语

江苏水生态文明建设应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贯彻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强化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理念,着力推进水生态的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立足江苏省情特点、发展阶段和工作基础,在“新天人合一”的生态视角指引下,走适应性建设道路,探索具有江苏省情特点的水生态文明建设模式,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水生态文明建设之路。

重点突出 4 个方面:一是“水清”,就是把水功能区达标作为最基本的民生需求,统筹规划建设城乡居民生活用水,让人民群众喝上干干净净的清水;二是“水秀”,就是把凸显江苏水乡自然风貌作为建设重点,科学推进生态脆弱地区水生态修复,让人民群众在更加明秀的水景观下生产生活;三是“水脉”,就是把江苏河网水系作为基础,科学配置生态生产生活用水,形成合理的水分布空间格局;四是“水敏”,就是把“水敏”建设贯穿节水型社会建设各方面,切实抓好水环境综合治理,打造自然渗透和净化的“海绵城市”“海绵家园”。

参考文献:

[1] 陈明忠. 关于水生态文明建设的若干思考[J]. 中国水利,2013 (15):1-5.

[2] HOLLING C S. Resilience and stability of ecological

果——对 40 个拆迁抗争案例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J]. 社会学研究,2015(5):90-114.

[42] 张虎彪. 民间环保组织的合法性建构何以可能——基于两个案例的比较[J]. 兰州学刊,2014(7):117-123.

[43] 卜玉梅. 从在线到离线:基于互联网的集体行动的形成及其影响因素——以反建 X 餐厨垃圾站运动为例[J]. 社会,2015(5):168-195.

[44] 马奔,李继朋. 我国邻避效应的解读:基于定性比较分析法的研究[J]. 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5(5):41-51.

[45] 谭爽,胡象明. 邻避型社会稳定风险中风险认知的预测作用及其调控——以核电站为例[J].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5):75-81.

[46] SCHMITT R. Organizational interlocks between new social movements and traditional elites; the case of the west German peace movement[J].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1989, 17(5): 583-598.

[47] 郇庆治. “政治机会结构”视角下的中国环境运动及其战略选择[J]. 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 (4):28-35.

(责任编辑:吴 玲)

systems [J]. Annual Review of Ecology and Systematics, 1973(4):1-23.

[3] GELDOLF G D. Adaptive water management; integrated water management on the edge of chaos [J]. Water Science & Technology, 1995, 32(1):7-13.

[4] SMEDT P. Towards a new policy for climate adaptive water management in Flanders; the concept of signal areas [J]. Utrecht Law Review, 2014, 10(2):107-125.

[5] MEZA F J. Water security and adaptive management in the Arid Americas [J].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2013, 103(2):280-289.

[6]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U. S.). Adaptive management for water resources project planning [M]. Frank: The National Academies Press,2004.

[7] BRODERICK K. Adaptive management for water quality improvement in the great barrier reef catchments; learning on the edge[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08, 46(3): 303 - 313.

[8] 曹建廷. 水资源适应性管理及其应用[J]. 中国水利, 2015(17):28-31.

[9] 金帅,盛昭瀚,刘小峰. 流域系统复杂性与适应性管理[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0, 20(7):64-71.

[10] 王慧敏. 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的适应性政策选择研究[J].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 18 (3):38-43.

[11] 王晓锋,刘红,袁兴中,等. 基于水敏性城市设计的城市水环境污染控制体系研究[J]. 生态学报,2016, 36 (1):30-43.

(责任编辑:高 虹)